

锡伯族西迁概述

吴元丰 赵志强

锡伯族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，总人口为四万余人，^① 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和新疆境内。其中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、霍城、巩留和塔城等地的锡伯族人，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，一般都会讲汉语、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，是我国会讲多种语言的民族之一。

明末清初，锡伯族聚居在我国东北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，隶属于科尔沁蒙古。1692年（康熙三十一年），科尔沁蒙古王、公、台吉等将锡伯族“献给”清政府，被编入满洲上三旗（镶黄、正黄、正白），分驻齐齐哈尔、伯都纳（今吉林省扶余县）和乌拉吉林（今吉林市）三城，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。^②

然而，清统治者以锡伯人众，恐后生事，便采取“分散各境，万不可使居一国”^③ 的分而治之政策，于1690年（康熙三十八年）到1701年（康熙四十年）期间，将三城锡伯族兵丁及其家眷都迁到北京、盛京及其所属之开原、锦州、辽阳、熊岳、金州和凤城等地驻防当差。^④ 这是锡伯族的第一次大迁徙。

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以后，为了加强新疆之防务，设了伊犁将军，并调拨满洲、索伦、绿营、察哈尔和额鲁特等兵到新疆驻防。但是，清政府仍感兵力不足，遂于1764年（乾隆二十九年），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锡伯官兵内，抽调年富力强者一千余名，连同家属迁到新疆伊犁，驻防屯田。^⑤ 这是锡伯族的第二次大迁徙。现在新疆各地的锡伯族人，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。

有清一代锡伯族的两次大迁徙，曾有不少人研究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但由于缺乏资料，未能写出较系统的论著。本文以我们最近发现的史料——满文档案，对锡伯族的第二次大迁徙试作一概述。

一

锡伯族迁入盛京前夕，清政府以锡伯等“宴中抢饼，不知出猎行军之道”^⑥ 为名，将所有“锡伯佐领、骁骑校，概行革职”。^⑦ 迁居盛京后，“于一切差使，均极奋勉”，^⑧ 逐渐

① 据民族文化宫《全国民族工作成就展览》人口统计数。

② 参阅康熙三十一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。本文所引档案，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其满文档案，由笔者译校，以下皆同，不再注明。

③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：《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》（初稿），第13页。

④ 参阅康熙三十七—四十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。

⑤ 参阅军机处乾隆二十九、三十年满文月摺档。

⑥ 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⑦ 同上。

⑧ 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满文上谕档。

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和启用，实际上不仅恢复了原来的官职，而且有了“官至二品大臣者，且官员之议叙、补授，均与满洲同”。^①乾隆也曾谕兆惠曰：“按旧例，凡卦尔察、锡伯等咸不委仕，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，于一切差使，均能效力，不可仍溺于旧例，著施恩一体委用”。^②可见锡伯族在第二次大迁徙之前，清政府对锡伯族的政策有了很大变化，不再溺于旧例，而与满洲一视同仁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锡伯族的政治地位又有了提高。

虽然如此，为什么乾隆年间又将锡伯族往新疆分迁，是否也是为了“分而治之”呢？回答是否定的。锡伯族西迁之事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的。

首先，1757、1759两年（乾隆二十二、二十四年），清政府先后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，伊犁地方人烟稀少，土地荒芜，防务空虚，沙皇俄国又不断地向东扩张。面对这种形势，清政府一面由内地派遣官兵，筑城驻防，一面从南疆移民屯田，并于1762年（乾隆二十七年），命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，驻伊犁惠远城，总理南北两路军政事务。但是，清政府仍感兵力不足，伊犁防务不甚坚固，以为地处伊犁东北的“塔尔巴哈台（今新疆塔城一带）地方，非但与伊犁毗连，且通阿尔泰、科布多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格朗图）等地，虽于伊犁驻兵，而塔尔巴哈台不驻，则西北两路，声势不能呼应，惟塔尔巴哈台驻兵，周围环设卡伦，则西北两路方能彼此呼应，伊犁军威，将更为强盛”。^③遂决定在塔尔巴哈台筑城，由伊犁派兵换防，交伊犁将军明瑞承办此事。明瑞深感伊犁现有官兵不敷调遣，乃具摺奏称：塔尔巴哈台所需换防兵，“若即于伊犁携眷满洲、索伦、察哈尔兵内派出换防，则凉州、庄浪之满洲兵，皆携眷来驻，初从戎行，其步射、枪法尚可，而马背技艺，一时不能谙练，既使苦练，亦需数年之暇”，“察哈尔兵，本选无能，情愿来居者移之，迁至伊犁后，方始操练，亦不能即成强兵”；“布特哈索伦兵，来年方能到齐。若后年春即遣驻塔尔巴哈台，则其家眷尚未定居，亦有不便之处”。^④最后，奏请调拨盛京的锡伯兵。

其次，伊犁地处边陲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需要强有力的兵驻守。锡伯官兵骁勇强悍，善于骑射，正合清政府的意愿。1763年（乾隆二十八年），伊犁将军明瑞请求增派官兵时奏称：“闻得，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、七千名，其中有锡伯兵四、五千名，伊等未甚弃旧习，狩猎为生，技艺尚可”，“于此项锡伯兵内，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，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”。^⑤明瑞在伊犁听说相隔数千里之远的盛京锡伯兵的情况，并奏请调拨，显然当时的锡伯族多少还保留着原来的游猎习惯，勇敢善战，有相当的声望，对于这一点，从锡伯兵迁到伊犁以后，在抵御沙俄侵略军和平定张格尔时的战斗中得到充分证明。

再次，让几个民族共处一地，互相牵制。这也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实行的政策之一。锡伯族西迁之前，清政府已经往伊犁陆续调拨一定数量的甘肃省凉州、庄浪的满洲官兵、陕、甘两省的绿营兵，黑龙江省的索伦、达斡尔官兵及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官兵，^⑥但仍

① 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② 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满文上谕档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满文议复档。

④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满文月摺包。

⑤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满文月摺包。在此，明瑞奏称锡伯兵“狩猎为生”，而锡伯兵抵伊犁后，又奏称锡伯兵“务农为生”，自相矛盾。其实，锡伯族早已从事农业生产，迁入盛京后，在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先进农业技术的影响下，锡伯族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了发展。尽管如此，农闲之际进行渔猎活动，也不是不可能的，新疆的锡伯族至今仍有渔猎之习惯。

⑥ 参阅祁韵士：《西陲要略》，见《小方壶斋与地丛抄》第2帙。

感兵力不足，需要增派官兵。当时，满洲官兵驻防全国重镇要地，不敷调遣，而蒙古、绿营、索伦、达斡尔官兵，已经调拨一部分，不便再调。惟盛京之锡伯官兵四、五千名，“近几年出兵时，未曾遣派”。①因此，从盛京抽调锡伯官兵，连同家眷移驻伊犁是必然的。

二

清政府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的锡伯官兵内，挑选年富力强，善于乘骑打猎的兵一千名，防御、骁骑校各十员，官兵之家眷三千二百七十五口，共计四千二百九十五人迁到伊犁。②但实际到伊犁的锡伯族人不止此数。据乾隆三十年，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奏称：“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穆呼郎、噶尔赛呈称：去岁，我等前来时，除已入印册之人口外，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余名。此外，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四百余名，当即询问伊等，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，由原籍起程时，跟随而来。其中，男二百四十七名，女一百五十八名。实系起程时跟随而来，并无他故。惟印册内无其名额。等因具结前来”。③按以上各数计算，当年实际迁到伊犁的锡伯族男女老少，共计五千零五十名（包括路上死的、逃的和少量外族人众）。

锡伯官兵等从盛京起程前，除由盛京户部支给被派出之防御、骁骑校各一年俸银外，又发给两个月盐菜银，每人每月二两，马六匹。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，每人每月一两五钱。每户发给整装银三十两，应发帐房、铁锅之折价银六两，马六匹，牛三头，车一辆。其家属自备两月口粮。④尔后，将锡伯官兵及其家口共四千二百九十五人分成两队，先后起程。“第一队派去之防御五员、骁骑校五员、兵四百九十九名、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七十五口，一并交协领阿穆呼郎（盛京城镶黄旗协领）管带，已于（乾隆二十九年）四月初十日起程。第二队派去之防御五员，骁骑校五员、兵五百零一名、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口，一并交协领噶尔赛（熊岳城协领）管带，已于（乾隆二十九年）四月十九日起程”。⑤

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，赶着牛车，离开自己多年生活的家乡——盛京后，出彰武台边门，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，⑥于八月二十四、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）。⑦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，已是青草无存，寒气凌人的季节，锡伯族官兵携带家眷，无法继续前进。于是，在乌里雅苏台扎营，等来年春草木返青，再赶往伊犁。

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，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，疲惫瘦弱，加之雪厚无草，开春之时，瘟疫流行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之牛三千零三十六头，先后倒毙二千五百九十六头，仅剩四百四十头；所带之马两千零二十四匹，虽然只倒毙二十多匹，但“大半疲瘦，生癞者众，……

①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满文月摺包。

② 参阅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三十年九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④ 参阅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⑤ 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⑥ 参阅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满文月摺档。彰武台边门是清代柳条边的一个边门，在辽宁省彰武县境内。据清代《黑龙江至新疆满文地图》和《十三排地图》考，克鲁伦路是沿克鲁伦河而上的驿站路。蒙古路是由归化城（今呼和浩特市）至乌里雅苏台的驿站路。两条路于克鲁伦河上游地方交叉。

⑦ 参阅官中满文朱批奏摺成袞扎布包。

不得其力”。①再不能靠这些牲畜的力量前往伊犁了。经管带协领阿穆呼郎、噶尔赛呈报交涉，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袞扎布奏准，“每两户给马一匹、驼一峰计，由此处（乌里雅苏台）牧场共拨马五百匹、驼五百峰给之。并令协领阿穆呼郎、噶尔赛将此等马驼，沿途妥善饲养使用，抵达伊犁后，照数交还”。②可见新拨给的马驼，不象由盛京拨给的牛马归锡伯族官兵所有，只是借给使用而已，若有倒毙者，还要赔偿。③

锡伯族官兵借到马驼之后，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，仍分两队，于1765年（乾隆三十年）三月初十日起，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。行至科布多一带，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，“数河俱溢，水深流急，不能行走，连日宿住，等水稍退。并穿绕科齐斯山而行，多受困数日。所剩兵丁之口粮，只足月余之食”，④所借马驼，也倒毙甚多，在这食粮将绝，畜力不足，行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，阿穆呼郎和噶尔赛无可奈何，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，一面带领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继续行进。从伊犁派人接济之前，余粮已尽，乃采野菜充饥。过了霍博克赛尔、察罕俄博，于六月十二、十五日，第一队行至珠尔虎珠、察罕霍吉尔等处，与前来接济之索伦佐领蒙武哩相遇；六月二十四、二十六日，第二队行至阿勒坦额墨、沙喇乌苏等处，方与前来接济之侍卫舒敏相遇。⑤两队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得到接济后，经过额米勒、巴图鲁克、博罗塔拉等地，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，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。⑥

数千名锡伯族人的西迁是在清政府的强迫命令下进行的，加之迁徙途中的千辛万苦，必然有人逃回家乡。然而，这种行动却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惩罚。乾隆亲自在盛京将军舍图肯奏报锡伯兵起程的摺子上批示：“如有私行逃走者，著严行查拿具奏。若未经奏闻，由他处发觉，唯尔等是问”。⑦因此，凡有人逃亡，舍图肯即严行查拿具奏。据已发现的满文档案记载，锡伯官兵及其家眷在整个迁移途中，有三起逃亡事件，共逃走五人。第一起，锡伯闲散萨木布、扎西二人逃回盛京后，都被拿获，押至乌里雅苏台，在锡伯官兵面前斩首。第二起，锡伯闲散古吉、家奴岳尔岱和巴尔虎闲散巴颜图三人逃回盛京后，又都被拿获，交盛京刑部处决，并咨文晓谕锡伯官兵。第三起，锡伯家奴朱尔干泰逃走，不知去向，未能拿获。⑧从以上三起逃亡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出所有逃亡的人都不是被选派的官兵，人数也很少，与康熙年间将锡伯族从齐齐哈尔、伯都纳等处迁至盛京时的逃亡情况相比，迥然不同。

三

锡伯族官兵抵达伊犁时，将军明瑞和参赞大臣爱隆阿尚未确定其驻防屯田之处所，乃“将伊等（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）仍交护送前来之协领阿穆呼郎、噶尔赛等管束，暂住乌哈里克

① 宫中满文朱批奏摺成袞扎布包。

② 同上。

③ 据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摺档内载，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摺，得知给锡伯官兵之马驼各五百，途中倒毙之驼三百一十四峰，马四百余匹，均由锡伯官兵折银赔偿。

④ 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⑤ 参阅军机处乾隆三十年七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⑥ 参阅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⑦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⑧ 参阅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六、七月满文月摺档及乾隆三十年正月满文上谕档。

空城（即绥定城）”，①休整训练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据明瑞于1764年（乾隆二十九年）为安置锡伯官兵事所奏一摺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明年，先派在雅尔（今塔城一带）筑城屯田之兵，并派马兵九百名看护，相应将伊犁两昂吉察哈尔兵，照明瑞原奏之例，皆移驻博罗塔拉好水草之地，以助塔尔巴哈台声威。惟今又增派锡伯兵一千名，应权衡利弊，酌情调办。明瑞与爱隆阿商定，来年锡伯官兵抵达后，察其情形，或仍令察哈尔兵驻博罗塔拉，或乘锡伯官兵前来之便，就近安置于博罗塔拉，俾其游牧之处，另行具奏请旨”。②锡伯官兵等抵达伊犁后，明瑞和爱隆阿亲临访察，方知“锡伯兵在原籍之生计，与民杂居城寨，仅以务农为生”。③于是，奏称：锡伯兵“今移驻此地，当举农牧并重，致力于此。若使伊等住在城内，则于农牧皆无裨益；若依照察哈尔、额鲁特之例，竟令游牧，则察其情形，非惟一时之所不能，亦难善务农事。理合指给便于耕种，近于放牧之地，令其居住，方于诸事皆有裨益”④博罗塔拉地方水草较好，适于游牧，且于1764年（乾隆二十九年），塔尔巴哈台开始筑城屯田后，博罗塔拉地方急需派兵驻守，故未等锡伯官兵抵达，即派察哈尔两昂吉兵暂驻博罗塔拉。察哈尔兵移驻博罗塔拉后，非常适应，“农牧皆得其利”。⑤因此，决定察哈尔两昂吉永驻博罗塔拉，而锡伯兵则等着划给一个既能耕种，又能放牧的地方。

当时，伊犁将军、参赞大臣及诸领队大臣都驻在伊犁河北的惠远城，有满洲兵驻防，城之西北，有索伦兵驻防屯田，城东有惠宁城，满洲兵驻守，惟城之南面有伊犁河，河之南边，防务空虚，且伊犁河不能依为天险，急需派兵驻防。此外，“伊犁河之南，惠远城对面之巴图蒙柯巴克（即巴图蒙柯）、绰豁罗拜兴（即绰豁罗）迤西，至豁吉格尔巴克（即豁吉格尔）一带，田腴水足，冬夏两季砍柴游牧之地均不远。若使锡伯兵驻此，非但与其生计有益，于地方形势、声势之连属亦有好处”。⑥遂于1766年（乾隆三十一年）正月，伊犁将军明瑞命锡伯官兵及其家眷“乘伊犁河冰冻，前往所指地方”（即伊犁河之南巴图蒙柯一带），⑦并令自行修建房屋，按牛录驻防屯田。

牛录是清朝八旗组织的基本单位，锡伯族官兵在乌哈里克城休整训练期间，伊犁将军等“按照索伦、察哈尔、额鲁特之例”，“亦设为一昂吉，下编六牛录。其中四牛录各为领催、披甲一百六十七人，两牛录各为领催、披甲一百六十六人”。⑧昂吉设有领队大臣、总管、副总管各一员。领队大臣由京城满洲官员中钦派补放，驻惠远城。总管、副总管等员，则“于此处（伊犁）戍守大员中，不论满州、索伦，拣选二人”补放，⑨其办事机构称为总管档房。各牛录设有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各一员，由锡伯兵内拣选补放，其办事机构称为旗下档房。至1767年（乾隆三十二年），伊犁将军阿桂奏请：“移驻之索伦、锡伯、察哈尔兵，

① 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② 宫中满文朱批奏摺明瑞包第4号。昂吉：准噶尔语，意为“分支”。又是准噶尔部台吉下组织名称之一，清朝沿用，嘉庆时改为“营”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④ 同上。

⑤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⑥ 同上。

⑦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满文月摺档。

⑧ 宫中满文朱批奏摺明瑞包第四号。

⑨ 宫中满文朱批奏摺明瑞包第十号。嘉庆以后，始由锡伯官员内补放总管和副总管。

按新额鲁特例，编立牛录。故不论旗分，曾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，每爱曼各设六牛录。今生齿日繁，一切差使等项而又烦冗，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官员管理，实属不足。……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等三爱曼，亦请同额鲁特爱曼，增编两牛录，俱为八牛录，以为八旗。……其旗纛颜色，亦应按旗授之”。^①得旨施行。锡伯昂吉增编了两个牛录，并颁发了镶黄（一牛录）、正黄（二牛录）、正白（三牛录）、正红（四牛录）、镶白（五牛录）、镶红（六牛录）、正蓝（七牛录）、镶蓝（八牛录）八种颜色的旗，从此成为驻防伊犁之锡伯八旗，即后来的锡伯营。

锡伯营主要驻守伊犁河之南的巴图蒙柯军台和固尔班托海、安达拉、沙布尔托海（又称沙巴尔托海）、托里、玛哈沁布克（又称马哈沁）、春稽、乌里雅苏图、额木讷察罕乌苏、霍依图察罕乌苏、塔木哈、察罕托海、托赉图、沙喇托海、厄楞莫多（又称额哩音莫多）、哈喇乌苏色奇音（又称勒克）、察林多欢（又称察林河口）等大小十六个卡伦。^②其次，派兵到塔尔巴哈台、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等地换防当差。所派官兵，均自备马匹、口粮，每两年或三年换班一次。

此外，锡伯营官兵还牧放近六百匹滋生马^③和三百多头滋生牛。^④滋生马“三年一均齐，即每三年本马一匹，取孳马一匹”；滋生牛“四年一均齐，即每四年本牛十只（头），取孳牛八只（头）”。^⑤可见锡伯营官兵的官差何等繁重。然而，锡伯营除其官员外，兵非同满洲八旗兵，月月食钱粮，惟有派去换防、驻卡和巡查边界者，方能领到盐菜银，每月一两五钱。锡伯营按牛录占有土地，披甲兵丁无事则耕牧，有事则应付，其家眷和附丁（未披甲者）则从事耕耘，并“养鸡畜豚”，^⑥“自耕自食”。^⑦

四

锡伯族虽然早已成为一个务农为生的民族，但每当农闲之际，演习骑射，行围打猎，故锡伯官兵之技艺高超，耕耘娴熟。移驻伊犁的锡伯族人民，栉风沐雨，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西北边疆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（一）抵御外来侵略，维护祖国统一

十九世纪二十年代，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新疆地区垂涎欲滴，指使其走狗——逃亡在浩罕的大和卓之孙张格尔进犯南疆，占据了喀什噶尔、叶尔羌、英吉沙尔与和田四城。清政府调动大军征讨张格尔。当时，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也率领锡伯营马甲近千人，远赴南疆，与各族人民并肩作战。在沙布都尔庄战役中，张格尔在该庄聚集“马步贼众不下十余万”，“并将渠水放淹田路，创挖坑坎”，^⑧与清军对峙。当此之时，额尔古伦军内锡伯兰翎骁骑校萨凌阿、马甲贝洪阿、图明阿、特克慎等冲锋陷阵，勇猛异常。“贝洪阿箭毙击鼓贼目，图明阿夺获贼马、鸟枪（枪）、铁钾（甲），众（贼）始溃散”。^⑨为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，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^① 军机处乾隆三十二年七月满文月摺档。爱曼：满洲语，意为“部落”。锡伯、索伦等爱曼迁驻伊犁后，每爱曼为一昂吉。

^② 参阅祁韵士：《西陲总统事略》卷9，第12页。

^③ 参阅军机处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满文月摺档。

^④ 参阅军机处乾隆三十五年五月满文月摺档。

^⑤ 曾国藩：《中国经营西域史》（193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本）第282页。

^⑥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6，第18页。

^⑦ 同上书卷6，第12页。

^⑧ 宫中汉文朱批奏摺“民族类维吾尔族项”第496号卷。

^⑨ 同上。

锡伯族人民与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民共处相往，并肩坐卡守边，与此同时，很多锡伯族人学会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。因此，锡伯族官兵除直接参加打仗外，一部分人还承担探报敌情的任务。张格尔败走卡外之后，锡伯马甲色布星额等经常被派去探报信息，及时探得张格尔不甘心失败，网罗其余众二百余，煽动布鲁特人等，“于官兵过年之时，意图潜进卡伦”^①之信息，如实地呈报伊犁将军长龄。将军长龄立即派出“各队官兵，竭力追捕”。^②张格尔被迫“直奔喀尔铁盖山”，因“山高路滑，众贼弃马扒（爬）山。胡超、额尔古伦、伊萨克等带领官兵、回子六、七十名，亦弃马扒（爬）山，力追毙贼五名，余贼滚山逃窜，复奔大梁。张逆仅余贼匪十余名，掷石回去。利勇巴图鲁·都司段永福、额尔古伦、胡超各带兵，一拥跟追直上，将及山巅，尽力枪（抢）追。该逆情急，拔刀将刎，胡超、段永福、锡伯马甲讷松阿、舒兴阿、兵丁扬发、田大武等奋力生擒，并生擒贼目数名，余贼剿杀无遗”，^③从而彻底平定了张格尔的叛乱。额尔古伦率领的锡伯官兵赴南疆征讨张逆，“历次打仗，均极奋勉”，^④积极发挥了骁勇强干，善于骑射的特点，冲锋陷阵，英勇杀敌，细心访查，情报无误，为消除分裂势力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。

1864年(同治三年)，沙皇俄国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，签定了不平等的中俄《勘分西北界约记》，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，就连锡伯族人民百余年来驻守的头勒克、察林河口、额哩音莫多等卡伦，也被沙俄割占。贪婪无度的沙皇俄国并不就此罢休，竟然乘阿古伯等在新疆作乱之机，出兵占领了伊犁，“于固尔扎城（今伊宁市）、博罗布噶苏（位于今伊宁市东北）、海努克（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向阳公社）回房，绥定城四处，分安俄官四名，管理各众。又从伊犁迤西图尔根起，包北面至伊犁城（即惠远城）东城固尔扎，安俄台五处，各处把守，水泄不通，日向各营逼勒银物，索要户口册籍”。^⑤锡伯族人民与当地各族人民一样，也陷于沙俄侵略者的奴役之下。俄人“将锡伯营防御吉噶布、委官本泰鞭打，将署领队喀尔莽阿看押凌逼”，^⑥但锡伯族以抗租、不为俄国办事等方式反抗沙俄。

同治末年，左宗棠分路进军新疆，更加激励了锡伯族人民的抗俄斗争。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不顾身家之安危，不断地组织锡伯族青年遣赴塔城，在荣全和金顺军前出力，并动员锡伯族人民，凡“俄国交办之事，均不遵办，且将伊犁情形，时常禀报将军（荣全）知道”。^⑦沙俄侵略者发觉后，凌逼喀尔莽阿“限半月内，变卖家产，携亲族出境（伊犁）。若不速去，即派兵拿送西毕尔（即西伯利亚）地方，永不令回国”。^⑧面对沙俄侵略者的威逼，总管喀尔莽阿大义凛然，“力与抗办”，但“俄人催逼不容”，不得已“切嘱锡伯营各官照旧办事，并留密人随时伺察禀报”。^⑨尔后，携眷离开伊犁赴塔城，喀尔莽阿到塔城后，就奉荣全和金顺之命，带领军营内所有锡伯官兵，到博罗塔拉地方，与察哈尔营军民一起开垦屯田，聚积粮草，有力地支援了左宗棠督军收复新疆及最后进军伊犁，赶出沙俄侵略军，喀尔莽阿不顾身家危安，坚持抗俄，反映了广大的锡伯族人民不屈不挠，抵御外侮，保卫祖国的

① 官中汉文朱批奏摺“民族类维吾尔族项”第490号卷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官中汉文朱批奏摺“民族类维吾尔族项”第496号卷。

⑤ 官中汉文朱批奏摺“民族类维吾尔族项”第166号卷。

⑥ 同上。

⑦ 官中汉文朱批奏摺“外交类中俄关系项”第166号卷。

⑧ 同上。

⑨ 同上。

爱国主义精神。

(二) 开发边疆 建设边疆

锡伯族移驻伊犁后，疏浚了伊犁河南边旧有的“东西长二百余里”的大渠，即绰合尔渠（清代有些书籍、图册内，又称锡伯营渠或锡伯旧渠），引水垦种。至嘉庆年间，锡伯族人口逐渐增多，原有田地已经不够用了，需要扩大耕地面积。但是，“渠（绰合尔渠）北地隘，虑在无田；渠南阻岸，患在无水”，^①向何处新开耕地，以除人众地少之虞？明智的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亲自察看地形，选择了绰合尔渠以南地方，决定开凿新渠，引伊犁河水灌溉。遂于1802年（嘉庆七年）兴工，图伯特率领锡伯族军民，采取边挖渠边引水种田的方法，经过六年的辛勤劳动，终于在1808年（嘉庆十三年）竣工，称为锡伯八旗渠，或称锡伯新渠，即“察布查尔”^②大渠，“东西长二百余里”。^③大渠一经开成，“辟田千顷，遂丰殖雄视”。^④在巴图蒙柯一带居住的几个牛录，也先后迁至“察布查尔”大渠南北两岸，按牛录筑城而居。

锡伯族人民不仅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兴修水利，而且还帮助兄弟民族开凿水渠，传授农业技术，为繁荣西北边疆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1790年（乾隆五十五年），伊犁将军保宁奏请增加满洲兵之钱粮时，乾隆帝就命保宁：“伊犁满洲兵驻防年久，生齿日繁，自应予以养赡之资。但国家钱粮原有定数，不容屡议增加。此次保宁所奏四百名步军钱粮，暂准其增添外，嗣后不得再请增给。若果因伊等人口众多，钱粮有限，不得养赡，伊犁地方现有可耕之地，甚为宽广”，^⑤即令满洲兵丁开垦屯田，以资生计。历任伊犁将军莫不尽力筹画办理，但“渠水未能办就，总未垦种”。^⑥迨至1802年（嘉庆七年），伊犁将军松筠才“相度屯地，疏浚泉源”，^⑦并照锡伯营八旗屯种之制，按名分给地亩，“自耕自食”，^⑧有所成效。至道光年间，满洲八旗人口又有增多，需要扩大耕地面积，但又苦于缺水，乃动员伊犁各营军民，开凿渠道，开拓耕地。锡伯族人民经过开凿“察布查尔”大渠，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，因此开凿渠道的主要任务就自然落在锡伯族人民的肩上。当时的锡伯营总管色布星额亲自筹画，率领锡伯营军民，与他族军民一起，开工凿渠。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，一条长二百余里的水渠，终于在道光末年告成，称为“皇渠”。而后，锡伯族人民又给满洲官兵传授耕作方法，促进了伊犁河以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间，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率领锡伯营和察哈尔营军民，在博罗塔拉地方开凿了一条五十余里长的哈尔博户大渠，引水垦种，聚积粮草。在支援左宗棠督军收复新疆的同时，给察哈尔蒙古人民传授了农业技术，推动了博罗塔拉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总之，锡伯族人民移驻伊犁后，与各族人民一道，对内反对一切分裂势力，维护祖国统一；对外抵御一切入侵之敌，保卫祖国边疆。努力兴修水利，开垦种田，并无私地给兄弟民族传授农业技术，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，为繁荣和巩固祖国的边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① 徐松：《西域水道记》卷4，第18页。

② 察布查尔：锡伯语，意为“粮仓”。解放后，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鼓舞下，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在锡伯族聚住区成立了锡伯自治县。锡伯族为了使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创业精神，更好地建设和巩固祖国的西北边疆，就以大渠之名——察布查尔，命名该自治县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。

③ 徐松：《西域水道记》卷4，第18页。

④ 同上。

⑤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6，第10页。

⑥ 同上书卷6，第16页。

⑦ 同上书卷6，第13页。

⑧ 同上书卷6，第12页。